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晋西北农村互助组述论*

贺文乐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针对老解放区农民互助合作行为存在明显涣散以及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严重现实,中共中央经过与华北、东北局的讨论研究之后,决定继续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图恢复农村经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动员农民进行互助合作则被赋予爱国生产的政治色彩。经济、政治动机后面其实更隐含着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本文以晋西北农村互助组为考察对象,在厘清互助组发展概况、运作机制以及基层心态变化的基础上,试图阐释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还原社会主义革命艰难历程的本相。

[关键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晋西北;互助组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9)01-0090-09

“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进行社会经济变革以图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举措。此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得到延续,并演变为全国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关于运动的动因,有生产力发展说、农民互助合作需要说、支援工业化说、传统社会主义理念说等^①。然而笔者在查阅晋西北部分县份互助组档案资料时却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晋西北农村互助组的发展远非农业生产力发展所致,亦非农民自愿的产物,而是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虽然农民未能阻止国家推行农业合作化的既定策略,但却影响其实施效果。实践与理想形成明显反差,促使国家政策调整往往朝着有利于农民利益保障的方向发展。

一、革命演进与互助组发展

倡导在农村建立互助组是中共新农村建设的既定策略,无论在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还是解放区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的。”^②同年9月全国政协一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将“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与生产合作”^③作为新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1950年,国家农业部又将劳动互助视为“新农业发展的方向”^④。与此同时,山西省政府认为“劳动互助是实现增产任务贯彻各个环节的组织保证”^⑤。老解放区的晋西北农村一方面遵从山西省委“发展互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建设研究”(17CZS04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吴鹏森、余君《传统社会主义理念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动因的再认识》,《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6月号(总第27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④ 李书城《1950年全国农业生产的概况》,《中国农报》1951年第1期。

⑤ 陈连《山西农业生产成果及组织领导中的几个环节》,《人民日报》1951年2月19日,第2版。

助合作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相结合”以“使它向近代化、集体化前进”的指导性意见^①,另一方面则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农民传统习惯发展互助组。

从革命演进与传统延续的关系剖析,晋西北农村互助组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革命型常年组,其特征为合作对象固定、有干部与党员领导、统一使用劳力与畜力、农业与副业结合较好、组内有简单的公共财产。第二类为传统与革命相结合的季节组。一般而言,这类型的互助组在坚持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基本原则的同时,干部、党员发挥核心领导作用,部分组能够做到统一使用劳力与畜力以及农业与副业的结合,但组内无公共财产。第三类为传统型临时组,以临时调剂劳力、畜力为主,组内不记工,系农民自发性互助合作组织。

1950~1951年期间,晋西北农村互助组的发展以传统型为主,革命型为辅。如1950年兴县专区^②传统变工组占互助组总数60%以上^③。又如偏关县1951年秋收组织1274个互助组,其中第一类有4个,占总数0.3%;第二类有60个,占总数4.7%;第三类有1210个,占总数95%^④。同时期,五寨县互助组“在数量、质量上均很差”,“大部分为临时季节的合牛变工,农忙变,农闲散,组内无制度,生产无计划,领导机构不健全。”^⑤就山西全省而言,截至1950年底,第三类互助组占总数的58.5%^⑥。正如山西省委所指“建立在群众旧习惯基础上的小型互助则更较普遍”^⑦。传统因素在互助组中依然占据绝对性优势,至少表明一方面农民参与互助合作有其自身的逻辑,主要基于劳力、畜力、农具及农活性质等方面的考虑,很少掺杂阶级意识,传统宗族血缘关系以及人情面子等成为维系互助合作的关键性纽带。另一方面,在晋西北农村尽管“党领导农民取得土地之后,农民在政治思想上已有相当觉悟,并有了初步的集体劳作习惯”^⑧,但互助组的发展并未完全遵从中共走农业合作化或集体化道路的革命逻辑。互助组向革命方向发展更多地基于“党员干部的积极工作”。如偏关县“四区刘满庄群众在党员干部的积极动员与领导下,热烈进行朋牛、买猪、翻晒种子、置购农具等工作。”^⑨即便如此,“朋牛”凸显了传统因素的固存,亦即革命在实践中并非与传统完全对立,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1952~1953年期间,晋西北农村互助组逐渐趋于革命型,表现为常年组在数量与质量上的提升。以1952年春耕为例,兴县专区“互助组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其中常年组由1951年1900个占总数18969个的10%增加为7663个占总数26609个的28.8%^⑩。其中,五寨县互助合作组织“规模超过已往任何一年,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空前提高了。”全县已有4个初级社、450个常年组、879个季节组。“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农户总数50.02%,较之1951年,同比增长100%以上^⑪。与此同时,大部分互助组实行死分活评的工分制,在耕作、耨耙、锄耩、施肥、使用新式农具、兴修水利等方面均做出了一定成绩。有资料记载,1952年宁武县共推广七寸步犁10部、五村步犁6部、水车12辆、铡草机2个、喷雾器82架、温度计711支^⑫。

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② 兴县专区系1949年建立,先后管辖兴县、临县、河曲、保德、偏关、神池、五寨、岢岚、岚县、方山、离石、中阳12县。

③ 兴县地委《兴县区1950年农业生产总结》(1951年1月30日),河曲县档案馆藏,档号(以下简称河曲档)3-1-2-7-1。

④ 偏关县委《秋收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2月3日),偏关县档案馆藏,档号(以下简称偏关档)1-1-129-1-43。

⑤ 五寨县委《关于140个互助组的总结向地委的专题报告》(1952年9月20日),五寨县档案馆藏,档号(以下简称五寨档):1-1-44-20-4。

⑥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第50页。

⑦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第51页。

⑧ 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41页。

⑨ 偏关县委《春耕生产工作通报》(1950年4月2日),偏关档1-1-128-1-6。

⑩ 山西省人民政府兴县专区专员公署《兴县专区1952年春季农业生产基本总结》(1952年6月),河曲档3-1-2-14-3。

⑪ 五寨县委《五寨县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步总结》(1952年9月1日),五寨档1-1-44-20-2。

⑫ 吕还元主编《宁武农业合作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随着互助合作优越性的不断显现以及农村整党运动、中国农民代表团访苏等重大事件的推动,在1952年冬和1953年春全国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热潮。随之而来的是冒进现象的发生^①。晋西北农村也曾发生类似问题,各地互助组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而积累公共财产,结果把“积累公共财产”变为“集中公共财产”。在此过程中,违背互助组自愿与等价互利原则,在未顾及农民生产、生活实况的情形下,就将其私有的牛、驴、骡、马等耕畜作价入组作为公有。如偏关县老营行政村互助组牲畜作价在3月14日统计时有作价组16个,到21日统计时上升至21个,共有132户、牲畜107头,占全行政村牲畜总数50%,占“组织起来”牲畜总数93%;土地2327亩,占全行政村耕地面积总数54%,占“组织起来”耕地面积总数90%^②。为此,县委决定“依据春耕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达到适时下种保证全苗,以发现问题、弄清情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教育群众、解决春耕中的实际问题为总原则,并紧紧结合生产,为搞好生产发挥互助组的作用进行纠偏。”^③

据相关统计数据,“纠偏”前偏关县共有互助组1094组、7814户,“纠偏”以后共有互助组1186个、8175户,增加了92组、361户,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13006户(工商业487户已除外)的62.9%。原来各项工作较落后的桃树坪村10个合牛形式的互助组经整顿,充实组织内容、贯彻人畜等价、制定记工制度与生产计划,进而扭转自流倾向,并由临时组提高为常年定型互助组^④。夏锄时,全县共有常年组405个,参加农户2483户,占农户总数19.1%;季节组367个,参加农户2156户,占农户总数16.6%^⑤。秋收时,全县共有常年组412个,参加农户2638户,占农户总数20.3%,季节性组543个,参加农户2084户,占农户总数16.0%^⑥。从夏锄到秋收,常年组的比例由19.1%上升至20.3%,而季节组的比例则由16.6%下降为16.0%。随着季节组与常年组的此消彼长,互助组的革命化趋势增强,即由“私”逐渐向“公”转化。

从1954年开始,晋西北农村常年组、季节组渐趋减少,尤其是那些较为巩固的常年组普遍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该年夏锄,偏关县常年互助组由春季的835个6468户发展到824个7113户;季节性互助组由春季的427个2584户减少到349个2148户。互助组的发展基本改变了“春紧夏松秋垮台”的现象,常年组中有286个组实行统一使用劳力与畜力、按技术分工、死分活评的办法,有19个组还仿照初级社采用三定包工制。据177个常年组的统计,有公共财产:牛10头、驴16头、骡子3头、猪38头、羊8只、糖166枝、温度计37个、喷雾器25个、步犁7张、耙14个、土地373亩^⑦。秋收时,全县共有常年组459个4057户,季节性组177个941户,共计4998户,占农户总数38.4%^⑧。随着常年组、季节组的转社与递减,互助组基本消失,晋西北农村逐渐走上合作化道路。

二、互助组的运作程式

如前所述,1950年代晋西北农村互助组在传统互助合作模式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过

① 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② 偏关县委《加强对互助方针政策的学习,不要盲目让互助组把牲畜作为公有的通报》(1953年3月25日),偏关档1-1-195-19-2。

③ 偏关县委《1953年1-5月5个月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总结报告》(1953年6月25日),偏关档1-1-195-19-5。

④ 偏关县委《1953年1-5月5个月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总结报告》(1953年6月25日),偏关档1-1-195-19-5。

⑤ 偏关县委《偏关县夏季互助合作运动总结报告》(1953年9月15日),偏关档1-1-195-19-12。

⑥ 偏关县委秘书处《偏关县1953年秋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总结报告》(1953年10月29日),偏关档1-1-195-19-18。

⑦ 偏关县政府《夏季生产工作总结报告》(1954年9月24日),偏关档3-1-15-1-24。

⑧ 偏关县政府《1954年农业生产工作总结》(1954年12月31日),偏关档3-1-15-1-27。

程“相对自然和顺利”^①。究其原因,运作机制的革命化程式不可置否。

1、加强组织领导。晋西北农村互助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组织领导的强化。正如兴县专署所指“如果我们不引导农民走这条路(合作化、集体化之路),农民就会自发的返回历史的老路。”^②为此,各级政府不断制定并执行相关政策与指示。早在1949年12月,偏关县委就在《偏关县1950年生产计划》中指出“动员男女老少所有劳动力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恢复战前生产水平,并有领导的与群众自愿的从原有的劳动变工基础上逐渐提高与组织变工互助,提高劳动效率,保证军工烈属的土地作务好。”^③1950年4月,该县县委在《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加强互助组领导的重要性,要求“未组织起的村,深入具体研究,依据等价交换、自愿两利原则,党员干部带头通过各种生产组织,并有计划培养领导变工生产的积极分子和模范”;“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变工组,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县区下乡干部应“具体给村干部、各组织干部人员布置生产任务,将所有干部统一领导,依村、片、户生产性质分工,挨门逐户检查帮助群众解除各种顾虑和具体困难问题,使生产计划一项一项顺利完成”^④。政府政策反复强调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在建立互助组过程中所发挥之引导、示范作用,充分表明互助组的建立与后者的领导推动密不可分。从此种角度来讲,互助组成为国家政治需求的产物,其组织程度与党员、干部或积极分子等组织者的人品性格有很大关联^⑤。如离石县小神头村1950年春耕,村支书兼劳模薛满太在上级号召下,亲自带头组织互助组。最初不但普通农户,就连部分党员、干部也表示难以接受,说“不顶事”。然而“薛满太同志有顽强的决心和信心”,团结其他2个干部组成3人互助小组。“在雨多苗稠草大的情况下,每天每个劳动力平均可锄苗二亩,超过单干户一倍多”。然后薛满太就用此种实例进行深入宣传与动员,并提出“组织起来做活快,二人能干三人的事”的口号。结果,一个由25户参与的大型互助组成立了^⑥。由此可见,党员、团员积极认真、身体力行之品性强化了互助组的合作程度。

当然,组织领导的强化还与对基层干部进行“组织起来”的思想教育有关。不定期举办各类培训班以及召开会议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保德县于1951年冬和1952年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组织起来”的思想教育运动。首先举办培训班,对党团员、宣传员、民兵以及妇女干部进行培训,先后有1500余人参与。其次,召开县区村三级干部会、党员代表会、团员代表会、妇女代表会、各界代表会、工业代表会、宣传员代表会、互助组长代表会、水利代表会、老农座谈会、技术会、劳模会、烈军属代表会等各种大小会议20次以上,先后有2000余人参加。所有训练班和各种会议都十分强调“组织起来”的思想教育。因此,凡是参加培训和会议的干部对“组织起来是第二个革命”的意义都有程度不同的认识,并成为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⑦。

互助组长代表大会的召开更是直接强化了基层干部对“组织起来”的认识。在1950~1952年期间,晋西北各级政府多次召开互助组长代表大会,属历史首创。互助组长会议由政府带头组织,各级干部代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代表参与。一般而言,会议遵循领导报告、小组讨论、典型互助组经验介绍的程式。不少会议报告指出大会提高了干部、互助组长的政治思想觉悟。如在偏关县1951年召开的互助组长代表大会上,白家咀村代表顾海锁说“听了其他村变工组介绍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结合副业、增加收入的经验,我对组织起来更清楚了,回去好好地教育

①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驢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② 兴县专署《农村生产方向》(1952年),河曲档3-1-2-16-10。

③ 偏关县委《偏关县1950年生产计划》(1949年12月),偏关档1-1-128-1-7。

④ 偏关县委《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1950年5月4日),偏关档1-1-128-1-1。

⑤ 卢晖临《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⑥ 兴县地委《离石小神头农业变工互助组》(1951年4月11日),河曲档3-1-2-7-5。

⑦ 保德县人民政府《保德县五二年春季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总结报告》(1952年7月15日),保德县档案馆藏档号2-1-36

组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组织起来就是农村发展的基本方向,是搞好生产的保证”^①。在五寨县1952年召开的互助组长代表大会上,通过典型互助组经验交流,与会代表一致反映“人讲卫生身体胖,地讲技术多打粮,要想产量提的高,技术改革不能少。”^②是年,在偏关县互助组长代表大会上,鸭子坪村互助组长代表崔二说“志愿军在前线流血那么决心,我们没防的人,组织起来多生产、多出汗,支援志愿军”^③。将互助组与生产致富、农村经济发展乃至爱国等国家分层分级战略目标的有机结合,无疑体现了大会规训、教化功能的升级与强化。

如何将上述规训、教化功能保持在一种高效能状态呢?打开言路进行“交心”的办法也许最为适宜。通过互助组长代表大会,不少代表认为“这下才明白了组织变工互助的办法”。如偏关县南场村互助组长代表张希存说“我村群众二十户组织了三个互助组,共同耕种不记工算账。现在才明白了这样的组织一定是要垮台的,回去一定要扭转那样的做法,贯彻自愿互利的等价政策。”有的说“马站互助组领导巩固的好,主要是在农业上加工的结果,高家湾的互助组所以垮台也就是因为重商业轻农业。”^④也就是说,农民式党员、干部思想动机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于眼前切实可行之实例,因为只有这样方可规避冒险所带来的不必要损失。

此外,通过互助组长代表大会,还将互助组生产作业纳入计划轨道。在偏关县1952年召开的互助组长代表大会上,46个村互助组长代表订出如下生产计划:(1)增产,每亩最高达到225斤(呕梨咀)、最低达到32斤(营盘梁),普遍实现增产100~200斤;(2)掏茬子,18个村达到100%,普遍达到50~80%;(3)耨地,18个村达到100%,普遍达到40~50%;(4)浸种,糜谷普遍达到100%,莜麦则达到10%左右;(5)互助组内每户平均植树25株;42个村修梯田571亩^⑤。此类计划的制订,凸显国家对基层社会经济干预程度的加强。换言之,生产计划事实上是国家集权机制在互助组内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中共力推会议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规训干部、党员参与组织性活动以便使党员干部逐渐形成集体化心理,进而使其驯服于集权机制之权威,并将后者推广至基层组织,形成有序的权力体系。

2、贯彻“三结合”方针。1950年1月,山西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出发展互助合作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相结合是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新方向。由此,“提高技术”被认为是充实“组织起来”之内容的主要因子以及满足农民生产需要的推动力^⑥。1951年2月,在山西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山西省委决定继续贯彻“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的方针^⑦。在山西省委政策指引下,老区的一些模范互助组进一步结合副业与供销,使互助合作内容得以充实,而新区在互助组建立之始即把组织农业生产与推广新技术、发展副业和组织供销合作社结合起来。晋西北属于老区,“三结合”方针在一些有互助合作基础的组内贯彻得较为深入,并且在不少村庄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与普及。

互助组与技术结合的具体举措包括技术传授站、技术研究会或经验座谈会的组建,选种与浸种技术的推广,新式农具、药剂与肥料的使用等。偏关县刘满庄村互助组成立一个以老农为核心的技术研究会,使老农将生产技术传授给年轻人,年轻人向老农学习耕作技术,经常座谈生产,保证按时

① 偏关县委《偏关县第三次互助代表会议总结报告》(1951年7月12日),偏关档1-1-129-1-19。

② 五寨县委《关于召开互助组长代表会议的专题报告》(1952年9月11日),五寨档1-1-44-20-3。

③ 偏关县生产办公室《偏关县变工互助组长会议报告》(1952年4月3日),偏关档3-1-41-1-4。

④ 偏关县生产办公室《偏关县变工互助组长会议报告》(1952年4月3日),偏关档3-1-41-1-4。

⑤ 偏关县生产办公室《偏关县变工互助组长会议报告》(1952年4月3日),偏关档3-1-41-1-4。

⑥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第45页。

⑦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第7~8页。

下种^①。该县 1951 年春耕普遍进行选种,一、二区共有 21 个行政村进行选种,所选之优种,由县确定 29 种为优种,并指示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广^②;1952 年水泉行政村 21 个互助组温汤浸种地、药剂拌种地、红矾杀虫地占总耕地比例分别达到 42.1%、6.3%、1.2%^③。又如宁武县 1952 年共有农业技术委员会 76 个、技术传授站 12 个以及 56 个小型实验农场,用于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与优良品种。与此同时,县委还制定了 6 项推广技术改革的措施:(1)大力开展积肥、压绿肥运动;(2)积极开渠打井,兴修水利;(3)合理使用地力,多种高产作物;(4)发动群众互助合作修梯田,达到户均 1 亩;(5)浸种拌药达到播种面积的 80%;(6)精耕细作多打粮。”^④尽管这种以传统生产经验为主、现代科技为辅的技术改进难以改变小农经济的基本特性,但其在增产方面产生的实效,有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进而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靠拢。

互助组与副业有机结合则迎合了农民发财致富的私有理念。可以肯定的是,凡是运作良好、成效明显的互助组,副业发展是重要的一环。如偏关县刘满庄村互助组除发展农业外,全村 26 户共养绵羊 230 余只,仅羊绒即可换回土布 40 余匹,解决了全村穿衣问题^⑤;庄窝村吴玉栋互助组抽出吴驼蛇等 3 人到矿区掏砂子 140 天赚洋 125 万元,木匠吴全海出外做零碎工 90 天赚米 6.5 石,还利用农闲抽驴去县城给供销社、商人驮运货物^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并鼓励农村副业发展,是中共刺激农民生产热情以便进一步积累公共财产建立集体经济的有效举措。正因为农民获得了物质利益,进而从心理上接受了中共和政府的恩惠。加之,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影响,这种来自中共和政府的恩惠事实上成为农民性格由“私”向“公”转化的根本动力。

此外,不少互助组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之下与供销社订立合同。供销社为互助组提供生产资料 and 日常用品并进行剩余产品的推销,而互助组则成为供销社便捷的货源集散地。据偏关县 71 个互助组的典型调查统计,共有 35 个组与供销社订立合同。其内容多系推销羊毛、鸡蛋、葫油、食粮等工产品和购买布匹、食盐、农具等生活和生产资料,交易总值为 94255000 元^⑦。又如五寨县一区 25 个互助组在 1952 年与供销社订立合同 27 件,供给生产资料总值 2600000 元、生活资料总值 8370000 元^⑧。此类合同的订立“促进了互助组和合作社双方的计划性,减少了生产和经营上的盲目性”^⑨,在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同时,也为供销社提供了市场,进而有利于基层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固。

3、建立激励机制。奖励是最为普遍的激励方式。偏关县陈家营村许占后互助组在秋收结束后召开劳动评比会议,组员们一致认为“许桂林不自私自利、老诚忠实,奖励他小猪 1 只,特别是妇女们在秋收中出了大力,每人要奖励些棉花。”这样激发了妇女的生产热情,当时即有 6 个妇女计划开豆腐坊 1 座以解决喂猪和自己吃豆腐的问题^⑩。组织互助组长到模范村进行观摩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激励方式。偏关县磁窑沟村秦贵生、王五来成领导的互助组种了 5 亩丰产糜子,产量高达 7 石。得此消息后,区干部组织邻村闫家沟等 3 村 15 个干部及部分组员进行了观摩。经观摩后,闫家沟村干部武林元改变了之前既不领导亦不整顿互助组、对区干部谈话置之不理的态度,亲自找区干部商

① 偏关县委《关于近来春耕生产工作的简单报告》(1951年5月9日),偏关档1-1-129-1-7。

② 偏关县委《关于近来春耕生产工作的简单报告》(1951年5月9日),偏关档1-1-129-1-7。

③ 偏关县生产办公室《偏关县71个农业互助组的调查报告》(1952年9月7日),偏关档3-1-41-1-15。

④ 吕还元主编《宁武农业合作史》,第27页。

⑤ 偏关县人民政府《1950年生产中几个问题》(1951年1月13日),偏关档3-1-15-1-2。

⑥ 偏关县生产办公室《偏关县第五区庄窝村吴玉栋农业互助组的调查》(1952年9月10日),偏关档3-1-41-1-17。

⑦ 偏关县生产办公室《偏关县71个农业互助组的调查报告》(1952年9月7日),偏关档3-1-41-1-15。

⑧ 五寨县委《关于召开互助组长代表会议的专题报告》(1952年9月11日),五寨档1-1-44-20-3。

⑨ 华北供销合作社《华北区供销社和互助组实行结合合同的情况和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8月29日,第2版。

⑩ 偏关县第三区区委《第三区秋收工作总结》(1950年11月1日),偏关档3-9-17-3-1。

谈整顿互助组的办法,并以身作则,找组员谈话进行个别动员,互助组最终得以巩固^①。这说明通过评比观摩,“以群众的经验教育群众,使农民进一步体会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②,顺势提高互助组的质量,进而扩大农业再生产。

将生产竞赛提升至爱国高度也是一种潜在的激励方式。1951年春耕,晋西北各地普遍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力倡“政治上必须和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结合起来”^③,认为“发动与组织劳模竞赛,是开展丰产运动的主要环节”^④。为此,不少地区以互助组为核心,订立爱国公约。偏关县刘满庄村互助组在劳模徐永泉的带动下,全村订立爱国公约,提出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并向全县劳模发出挑战书。随即红庙等10个村向刘满庄村应战^⑤。其中红庙村订立爱国公约较为实际,提高了干部领导互助合作的兴趣,村干部武占红如是说:“过去人家说我们红庙甚也搞不起来,现在人们说红庙工作搞的还好呢。”^⑥另据相关数据统计,全县有40%的村订立了爱国公约,捐款710余万元用于慰劳中朝人民军^⑦。同年秋收,全县有43个自然村的45个变工组相继向刘满庄村应战。在此影响下,有32个自然村的68个变工组也相互进行生产竞赛^⑧。将爱国与丰产紧密结合,有助于丰产目标的实现。如刘满庄村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后,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初步完成生产计划。其中,“夏田作物早已种完,原计划豌豆粪滚50%,结果做到60%,推动全行政村粪滚豌豆150垧(往年很少粪滚);原计划50%的地刮崖溜畔,实际做到70%……全村共植树400株,超过原计划1倍。”^⑨至此,爱国丰产运动产生的实效,激励了农民的生产斗志,使其在心理上接受“组织起来”,进而与中共乡村治理构想合拍。

三、基层社会群体心态的变化

前述运作机制的演化并非一蹴而就,事实上基层社会群体在被“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心态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来自基层干部、互助组内部以及农民三个层面。

在基层干部方面,经验主义思想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有效执行。如前所述,在1950年春耕前偏关县政府制定了较为科学而周密的生产计划。即便如此,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其一,不按实际死定计划。甲咀村已喂猪17头,但在该行政村召开的党员会上干部不负责地订了15头的计划。车道坡村因气候关系不宜种胡麻,却定了种胡麻20垧的计划,结果为后来召开的代表会所否决。其二,工作不深入,犯了急性病。1950年春耕偏关县二区20个行政村同时召开19个村的党员大会。因会前准备不充分,未掌握党员主要思想情况,加之个别干部领导能力差,致使会议收效甚微。如草垛山、黄龙池两村干部在党员会上机械给党员死读《党员课本》,同时将党代会的决议只做了一般的传达,未能很好启发党员深刻讨论^⑩。其三,放任自流。不少党员、干部对互助组合作普遍存在着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态度,有的认为“生产互助,不领导他(群

① 偏关县第一区区委《秋季互助合作检查报告材料》(1953年9月29日),偏关档1-1-207-31-9。

② 王丕绪、李德生《今春山西省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人民日报》1952年5月8日,第2版。

③ 偏关县委《关于近来春耕生产工作的简单报告》(1951年5月9日),偏关档1-1-129-1-7。

④ 兴县地委《关于神池发动劳模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通报》(1951年4月39日),河曲档3-1-2-3-24。

⑤ 偏关县委《关于春耕生产变工互助情况报告》(1951年7月6日),偏关档1-1-129-1-17。

⑥ 偏关县政府《夏季生产简报》(1951年7月24日),偏关档3-1-15-1-8。

⑦ 偏关县委《关于五月初到五月下旬生产工作简报》(1951年5月29日),偏关档1-1-129-1-7。

⑧ 偏关县委《秋收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2月3日),偏关档1-1-129-1-43。

⑨ 行龙、马维强、常利兵《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⑩ 偏关县委《春耕生产工作通报》(1950年4月2日),偏关档1-1-128-1-6。

众) 还会吗?”^①也有的认为“没经验、不好组织”,“怕麻烦、怕误生产”^②。如偏关县三区 1953 年 5 个支部共有党员 158 人,春耕领导互助组的有 132 人,夏锄只有 76 人。部分地区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党员虽然参加但不愿当组长。如偏关县贾堡村支部委员崔宣,群众叫他当组长领导,他还推诿,后经区干部劝说他才同意担任,实际相当于指定^③。还有不少干部脱离群众,使用打击、排挤、歧视等强硬手段组织互助组。偏关县迤西村党员史引来动员农民池润年说“你过去很穷,公家每年起来救济你,现在你还不入组?”池润年怕以后得不到救济而勉强入组。在牲畜作价时,方城村副村长田张拴对群众说“不入牲口作价组,连盐也在供销社买不上”。南场村长张希存在广播筒上喊了 3 次话,说“不参加互助组是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哩!”于是,群众在不了解政策的情况下盲目组织了 4 个牲畜作价组加以应对。也有不少干部用有色眼镜看待单干户。高家湾村干部到处高喊“好人不单干,单干没好人”,黄龙池村称个体农民为“单干鬼”。上井坪村供销社主任李常义在个体农民提出与他打扑克时,他竟然说“不和你们这单干户打”。基层干部诸如此类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造成群众思想的混乱。不少农民“怕现在不入,以后无去处”,同时在干部“要搞都搞个高级的”之类言论影响下,不得已将牲口作价为公有。三区店湾村农民闫保奎说“迟早也的(得)走这条路线,咬紧牙关早点参加吧!”南场村农民吴树根怕“共产”、“归公”,用 3 垧头等好地换回葫油 50 斤^④。

互助组内部多种矛盾并存。以夏锄为例,矛盾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技术高低的矛盾。有些农民爱精锄不求多锄,有些则爱多锄不求精锄。第二,劳力强弱的矛盾。强者不愿和弱者互助,而弱者不愿顶厘工。第三,上地迟早的矛盾。有些农民爱迟走中午不歇晌,有些则想早走多赶工。第四,男女合组的矛盾。男人合脾,女人不对头(多系生活作风所致)。第五,锄地先后的矛盾。几乎所有农民都想先锄而不愿后锄。第六,劳力、土地不对等的矛盾。劳力多者想赚工资,劳力少者却不愿出工资而坚持还工。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矛盾,实则系农民惯习影响下理性选择与国家所倡导集体理念发生了冲突。偏关县高家湾村互助组长高有元在 1951 年 7 月召开的县互助组长代表会议上如是说“我们春上由 13 户组成一组,在夏锄开始因技术问题不等同,就有 3 户出了组。”^⑤随着互助组规模的扩大,农民既有道德规范让位于理性选择。

农民传统理念固存。在社会主义革命急速演进的过程中,农民传统私有理念与国家所倡导之集体理念发生冲突。如有些农民怕共产吃大锅饭、怕冒尖、怕上升,形成“生产不致富,劳动不节约”的思想^⑥。进一步来讲,当“公”压“私”或农民切身利益受到侵犯时,农民就会消极应对。1953 年春,曲家湾村白五因牲畜作价欠债 90 多万元,愁得旧病复发;教子沟村李二汉的 1 头母驴作价入组后被卖掉,他女人连续好几天哭嚷着要驴^⑦。尽管此种应对并非激烈抗争,但它足以表明牲畜作价入组这一举措事实上已经触犯了农民的利益底线。有些农民甚至发出毒誓,如偏关县某村农民张富在畜归原主后,极不满意地说“割了我的头,永也不再互助了”^⑧。此类现象的产生严重侵犯了农民私有产权,必然伤害其生产积极性,并进一步造成落后村讽刺先进村、单干农民嘲笑作价组的现象风行一时。偏关县教子沟村农民杨三说“共产党的话听不的(得)”;教儿塬村长许应中给组员开会说“畜归原主哩,组织起来变大了,各人赶回各人的牲口”;大庄窝村长弓润月拍大腿说“没有组

① 河曲县委《河曲县 1950 年夏季生产工作总结报告》,河曲档 4-1-1-1-3。

② 兴县地委《关于五寨春耕生产运动的通报》(1952 年 6 月 2 日),河曲档 3-1-2-16-42。

③ 偏关县委《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六月一个月垮台情况的报告》(1953 年 7 月 8 日),偏关档 1-1-195-19-8。

④ 偏关县委《1953 年 1-5 月 5 个月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总结报告》(1953 年 6 月 25 日),偏关档 1-1-195-19-5。

⑤ 偏关县委《偏关县第三次互助代表会议总结报告》(1951 年 7 月 12 日),偏关档 1-1-129-1-19。

⑥ 偏关县政府《1950 年生产中的几个问题》(1951 年 1 月 13 日),偏关档 3-1-15-1-2。

⑦ 偏关县三区区委《春耕生产工作总结》(1953 年 5 月 31 日),偏关档 1-1-185-9-12。

⑧ 偏关县三区区委《偏关县第三区秋季工作总结报告》(1953 年 10 月 20 日),偏关档 1-1-185-9-19。

织互助组可闹对了。”^①农民此番话已经表明急速革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形塑农民性格之难度远远大于对其行为的规训。

四、结 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对互助合作运动的推行经历了由涣散到鼓励再到冒进,最后又予以纠正,并最终引导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基本历程。期间农村互助组的发展,成为新政权试图以渐进式策略改造传统小农经济,以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革命表征。本文以这一时期晋西北农村互助组演变发展史为线索,力图从中管窥中共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对传统进行革命的内在逻辑。

研究表明,传统与革命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在互助组发展的初始阶段,农民互助合作传统占有绝对优势。正因传统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当然,革命的渐进演变也促使农民传统得以部分改造。随着互助组规模、内容发生变化,中共的动员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先后诉诸典型示范、会议规训、技术革新、激励机制、爱国主义教育等多种方式,逐渐将传统纳入革命之中。因之,中共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构想与农民传统互助合作理念在某种程度上相契合。

不过,传统与革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限界。农民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向中共革命型合作化模式的转变并非完全没有限度。此种限度以农民私有理念与道德伦理规范为准绳,而非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当革命在准绳之内演进时,农民会积极迎合革命。反之,一旦革命越过准绳,农民就会以消极态度应对革命。前文所述互助组“冒进”的史实即是很好的例证。“私”与“公”、“分”与“合”相互牵制,即农民“私”、“分”的传统理念与中共“公”、“合”的革命意志之间的互动构成农村互助组发展的历史图景。

(本文作者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山西临汾 041000)

[责任编辑:江俊伟]

本 刊 启 事

本刊已入编中国知网及其电子期刊网站,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都将自动进入该电子出版物,本刊所付稿酬已包含电子出版物及网上服务的报酬,不另计酬,凡有不同意者请特别声明。

本刊编辑部

^① 偏关县三区区委《春耕生产工作总结》(1953年5月31日),偏关档1-1-185-9-12。